

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主办

王继平◎主编

曾国藩研究

ZENG GUO FAN YAN JIU

【第5辑】

湘潭大学出版社

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主办

王继平◎主编

曾国藩研究

ZENG GUO FAN YAN JIU

【第5辑】

湘潭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研究. 第5辑/王继平主编. -湘潭:湘潭大学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81128-145-3

I. 曾… II. 王… III. 曾国藩(1811~1872) — 人物研究 — 文集 IV.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1490 号

曾国藩研究 (第5辑)

王继平 主编

责任编辑: 阳 勇

封面设计: 罗志义

出版发行: 湘潭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

电话(传真): 0731-58298966 邮编: 411105

网 址: <http://xtup.xtu.edu.cn>

印 刷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32

字 数: 609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28-145-3

定 价: 62.80 元

(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)

《曾国藩研究》编辑委员会

- 主 办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
顾 问 唐浩明（岳麓书社）
主 编 王继平（湘潭大学）
委 员 欧阳哲生（北京大学）
郑大华（中国社会科学院）
方光华（陕西省教育厅）
李建国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）
王晓天（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）
刘云波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）
李育民（湖南师范大学）
周秋光（湖南师范大学）
杨鹏程（湖南科技大学）
樊锦文（曾国藩研究会）
刘安定（曾国藩研究会）
胡卫平（曾国藩故里管理处）
彭先国（湘潭大学）
罗玉明（湘潭大学）
郭汉民（湘潭大学）
章育良（湘潭大学）
陈代湘（湘潭大学）
编辑部 王继平 章育良 李永春 周锦涛 刘志靖
地 址：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
邮 编：411105
E-mail: jpwang@xtu.edu.cn
liu_zhijing@126.com

CONTENTS

目

录

目 录

曾国藩研究

曾国藩非理学家辨	易孟醇(1)
曾国藩诗歌特色论	李剑波(11)
论曾国藩对两淮盐务的治理	陈芳(20)
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	常耀弘(61)
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	汪磊 李平(88)

曾国藩及其书学理论研究	敖 侠(138)
曾国藩人才思想研究	梁贵超(170)

湘军研究

曾国荃研究	王艳娟(210)
湘军立名及其发展考述(二)	胡卫平(263)
湘军立名及其发展考述(三)	胡卫平(277)

湖南历史文化研究

湖南绅士与晚清教育变迁	肖 华(289)
近代湖南桐油贸易研究	李 菁(369)
魏源与近代湖湘文化	焦 徽(407)

评 论

曾国藩研究述评(1949—2009)	焦 徽 管宏平(415)
湘军研究述评(1949—2009)	李占虎(482)

研究生园地

曾国藩自杀及其原因	唐文彬(500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曾国藩非理学家辨

易孟醇

现在仍有不少人说曾国藩是理学家。对吗？这问题应着一句老话：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

曾国藩年轻时确曾有过对理学的热烈追求。道光末年，他在翰林院时师事太常寺卿唐鉴。唐鉴，字镜海，湖南善化人，“三十而志洛闽之学”^①，时被称为理学大师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（1841年8月30日），他回答曾国藩提出的“检身之要，读书之法”的问题说：“当以《朱子全书》为宗。”“此书最宜熟读，即以为课程，身体力行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。”^②听了这番话，曾国藩“昭然若发蒙也”，从此，他“始肆力于宗学”。^③后来，他自述道：“国藩本以无本之学，寻声逐响，自从镜海先生游，稍乃粗识指归……”^④在《送唐先生南归序》中，他更深为感激地说：“吾党之士三数人者，日就而考德问业。虽以国藩之不才，亦且为义理所薰蒸，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。”^⑤

问学于唐鉴的同时，曾国藩又“求友以匡己之不逮”。他在北京的师友，

①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68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7年版，第92页。

③ 黎庶昌：《曾国藩年谱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7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90年版，第3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68页。

“讲躬行心得者，则有镜海先生、艮峰前辈、吴竹如、窦兰泉、冯树堂；穷经知道者，则有吴子序、邵蕙西”^①。他订立了静坐、早起、养气、保身等十二项课程，并天天写日课册，记载心得，检查言行。他还把日课册送请理学家倭仁（字艮峰）批阅，倭仁在日课册的天头上写有不少穷理修身的批语。

这个时候的曾国藩，一再声称自己“一宗宋儒”。他的同僚和朋友也盛传他已成为了理学家。他甚至企图以理学去影响弟弟们：“兄之私意，以为义理之学最大。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。词章之学，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。”^②

到了中年，他作《圣哲画像记》，把宋理学家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等五人列入三十二圣之中，与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孔子、孟子等并列，并毫无根据地颂扬说：“后世君相师儒，笃守其说，莫之或易。”^③晚年，他奉命去处理天津教案，刚到任即颁布《劝学篇示直隶士子》，谆谆然“与直隶士子约：以义理之学为先”，并说：“君子贵慎所择，而先其所急。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，则莫急于义理之学。”^④

清朝廷自康熙年代起，一直推崇理学，以理学为治国正学。对于曾国藩这个信奉理学的“中兴功臣”，清廷自然要把他纳入理学的大旗之下，在御制碑文中，盛赞曾国藩“阐程、朱之精蕴，学茂儒宗”。门生李鸿章为他写的神道碑，称他“为学研究义理，精通训诂”。友人郭嵩焘为他写的墓志铭，也颂扬他“穷极程、朱性道之蕴”。这些，都在企图为曾国藩盖棺定论。

根据上述两方面的事实，说曾国藩是宋代理学的信徒，有一定道理。这叫事出有因。

然而，查无实据。

首先，他没有任何理学著作，何以称为“家”？通观曾国藩的一生，翻阅他的全部著作，只有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的朝考试卷《顺性命之理论》、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和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两封给刘蓉的信，谈了点理学问题。另外，他就刘传莹所辑《孟子要略》写的二十二条按语中，有十一条谈及义理。后人王启源为他整理的《读书录》，涉及七部经书，共二百八十一条，其中谈义理者仅七条。我们不能凭着一张考卷、十八条批语和书信、日

①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47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55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249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442页。

记中的只言片语，就说他是“家”。另一个湘军头领罗泽南，也是一个信奉理学的人，著有《西铭讲义》、《读孟子札记》、《太极衍义》、《姚江学辨》等，却似乎没有人称他为理学家，遑论曾国藩？可惜的是，罗泽南的理学著作和经学思想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，研究得很少，很不充分。

曾国藩死后，王闿运送去一副挽联，曾纪泽不让人挂起来，因为挽联是这样写的：

平生以霍子孟、张叔大自期，异代不同功，勘定仅传方略；
经术在纪河间、阮仪征之上，致身何太早，龙蛇遗憾礼堂书。

上联说曾国藩有汉霍光、明张居正那种“平天下”志，却仅在东南方面有“勘定”之功，无霍、张那种把握全局的功业。下联颂扬曾国藩的经术在本朝纪昀、阮元之上，可惜却像郑玄那样，有“岁在龙蛇贤人嗟”的遗憾，不得于礼堂写定经学著作。曾国藩没有经学著作传世，与他长期投入战争、军务政务繁杂有关，也许与他仅六十一岁多一点便死了，“致身何太早”有关。但没有理学著作却是确然不移的事实。

其次，他一生的言行，也无法证明他是理学家。诚然，我们不能以是否有著作作为是否是“家”的唯一标准。实践，当是更重要的标准。

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三日（1851年10月7日），当曾国藩汲汲于理学追求时，却写出了这样的诗句：

不如尧桀两忘去，
日摩顽石支头眠。

谢枋得，字君直，号叠山，是南宋亡国之臣，坚决不仕于元，以卖卜为生，后被元朝廷强行拉入京城，授之官，绝食而死。他卖卜时所用的砚台，为后世所宝。曾国藩借咏谢枋得遗砚的机会，竟然吟出这样黑白不分、愚贤一例、玩世不恭的诗句，还有半点理学家的影子吗？

诗中，他对这位亡国之臣表达了崇高的敬意：

大宋河山沧桑改，

孤臣心事金石坚。^①

这，还可以勿论。他竟然还叹颂明末亡臣、坚决反清的顾炎武：

昌平山水委灰烬，

可怜孤臣泪纵横。

东西南北辙迹遍，

断柯缺斧终无成。^②

这样的诗句表明：曾国藩不是一个绝对忠于清皇朝，强调修身养性的理学家。

考察曾国藩一生的言行，充分地证明曾国藩甚至不是一个醇儒。咸丰初他出办团练后，立即变而采取申、韩之术，崇尚法家思想。他一再声称要“师武健严酷之名”，要“严刑峻法”、“纯用重典”。^③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，他一再嘱咐曾国荃：“克城以多杀为妥，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……”^④连儒家的“仁”字大旗也丢掉了。他毫不掩饰地说：“吾家兄弟带兵，以杀人为业……”^⑤这样的言行，还有半点理学家的影子吗？章太炎曾批评“理学杀人”，指的是理学的教义扼杀了人的正常要求和发展。其实理学家也有直接举起屠刀杀人的。朱熹镇压过湖南蒲来矢农民起义，王守仁镇压过江西南部几个县的农民起义和广西的少数民族起义。但，他们比起曾国藩来，确是小巫见大巫。曾国藩在咸同之际的所作所为，跟宋明理学家强调“穷理”的追求，强调“存养”的功夫，已相去很远了。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概括说，曾国藩“一生三变”，“在京官时，以程朱为归依，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，又变而为申韩”，晚年提倡老、庄意趣。^⑥这确是知根知底、切中肯綮之言。

曾国藩晚年身处高位，出将入相，已是心满意足，这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常常受到御史们的弹劾，还有来自清朝廷的猜忌以及满汉隔阂，这使

①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40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60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7年版，第44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726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638页。

⑥ 欧阳兆熊、金安清撰，谢兴尧点校：《水窗春呓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17页。

他惴惴不安，加上体弱多病，视力严重下降，几至失明，因而他又改而强调师老、庄之无为与虚静。他写道：“因九弟有事求可、功求成之念，不免代天主张，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，嘱其游心虚静之域。”^① 他解释说：“灵明无著，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时不杂，既过不恋，是之谓虚而已矣，是之谓诚而已矣。”^② 这种“物来顺应”和“不迎、不杂、不恋”的态度，几至冥顽不灵、随波逐流、玩世不恭的程度。他还说：“立身之道，以禹、墨之‘勤俭’，兼老庄之‘静虚’，庶于修己、治人之术，两得之矣。”^③ 这明确地表明了他要以道家虚静的“出世”思想作为“立身之要”。

曾国藩还说：“若游心能如老、庄之虚静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，齐民能以管、商之严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补之，则诸子皆可师也，不可弃也。”^④ ——“诸子皆可师也，不可弃也”，这是曾国藩宣布自己不是理学家，而是师百家的杂家的严正声明。谁曰不然？

晚年，曾国藩在“剿发逆、勤远略”的策略驱动下，思想又起了微妙的却是重大的变化，大办洋务。他研读过魏源的《圣武记》和《海国图志》以及徐继畲的《瀛环志略》，把眼光投向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。同治十年十月十一日（1871年11月23日），是曾国藩六十一岁生日，他正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视察，前来祝寿的达一百六七十人，共开二十二桌酒席。他唯独留“孙家谷坐最久”，因为“渠出使外洋诸国三年，故与谈询洋务”。^⑤ 此时，他甚至已把西学中的“军政、船政，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”^⑥。这些，岂可与那位大喊“以仁义为干戈”的理学家倭仁同日而语、比肩并称？

二

上面从曾国藩一生的行状考察，表明他非理学家，再从他的学术思想看，可进一步证明这一点。

①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（二），岳麓书社1988年版，第721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7年版，第130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7年版，第574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7年版，第652~653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（三），岳麓书社1989年版，第1910页。

⑥ 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（十二），岳麓书社1994年版，第7331页。

（一）肯定汉学

清代自康熙帝为巩固统治秩序而大力提倡理学以来，理学一直被视为正学。康熙帝命理学家熊赐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、内阁大学士，参议朝政；又命大学士李光地修改明成祖时编修的《性理大全》为《性理精义》；还亲自为李光地编纂的《朱子大全》作序，说这本书“绪千百年绝传之学，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规”，“非此〔书〕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，非此不能治万邦之衽席，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，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”。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十月，他颁布了《圣谕十六条》，明确规定理学为正学，应“黜异端以崇正学”。雍正帝后来又据此补充，成《圣谕广训》颁行天下。清朝廷对国子监的满、汉生员习读经书，对广大士人科举考试，都规定以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为基本内容，以宋理学家的注释为准则。

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曾国藩“一宗宋儒”，也是很自然的。因为“一宗宋儒”，他曾对汉学持明显的鄙弃态度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（1843年2月15日）写信给诸弟说：“自西汉以至于今，识字之儒约有三途：曰义理之学，曰考据之学，曰词章之学。各执一途，互相诋毁。兄之私意，以为义理之学最大。考据之学，吾无取焉矣。”^①不止如此，他同年在致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：“今之学者，言考据则持为聘辩之柄……言之者不作，信之者贵耳，转相欺漫，不以为耻。”^②这种攻击，可谓不遗余力了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十一月，他为唐鉴《国朝学案》作的后记中，严厉批评本朝的汉学家惠栋、戴震“名目自高，诋毁日月，亦变而蔽者也”^③。

但是，随着他在政界阅历的加深，随着读书面的扩大，曾国藩开始觉察到：“今之讲理学者，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，讲汉学者，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，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……”^④对汉学、宋学，他已摆出了一副“平等对待”的态度。

这种“平等”态度，在他的《圣哲画像记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他认为：“书籍之浩浩，著述者之众，若江海然，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。要在慎

①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55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90年版，第4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66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（三），岳麓书社1989年版，第1486~1487页。

择焉而已。”^①他“慎择”的古今圣哲，共三十二人，其中除周、二程、朱、张等五位理学家外，还包括《说文》的作者许慎、汉学大师郑玄和清代的文字训诂学家王念孙^②。他寓居京师报国寺时，曾研读过《说文》，吟诗称赞道：“段生晚出吾最许，势与二徐争嶙峋。”^③二徐，指北宋初的文字学家徐铉、徐锴兄弟。他称赞“两汉经生，各有渊源”^④，声称“国藩于本朝大儒，学问则宗顾亭林〔炎武〕、王怀祖〔念孙〕两先生”^⑤；“王氏父子〔王念孙、王引之〕之博，古今所罕”^⑥。他检讨自己说：“余于道光末年，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，从事戎行未能卒业。”^⑦这些言论，足以证明曾国藩对汉学的高度肯定。他声称：“国藩一宗宋儒，不废汉学……”^⑧

（二）肯定心学

程、朱理学与陆、王心学，在心与物的关系上，认识相近，即都是唯心主义的，都不承认物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）是第一性的，不承认先有物然后才有心（认知），才有理。程颢、程颐说：“天下物皆可以理照”^⑨，“天者，理也”^⑩。朱熹说：“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。”^⑪他们都认为理是第一性的，故说“道外无物，物外无道”^⑫，“万物皆备于我，不独人尔，万物皆然”^⑬。陆九渊比程、朱走得更远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人皆有是心，心皆是理，心即理也。”^⑭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”^⑮王守仁说：“无心外之理，心外之

①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248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252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60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67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749页。

⑥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477页。

⑦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二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809页。

⑧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（五），岳麓书社1992年版，第3467页。

⑨ 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。

⑩ 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一。

⑪ 朱熹：《答黄道夫子书》。

⑫ 张伯行：《濂洛关闽书》卷三。

⑬ 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。

⑭ 《陆九渊集》卷十一。

⑮ 《陆九渊集》卷二十二。

物。”^①在天理与人欲、无极与太极、认知与治学等问题上，程、朱与陆、王的主张也截然不同。宋淳熙三年（1176年），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之会上的争辩，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。正如曾国藩所概括的：“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，遂成冰炭，诋陆子为顿悟，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。”^②

曾国藩初入理学之门时，门户森严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他指责王守仁的“致良知”“是任心之明，而遂当乎万物之分，果可信乎？”又说：“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，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，与凡物了不相涉，而谓皆当乎事物之分，又可信乎？”^③同年十二月，他在《书学案小识后》中说王守仁：“说主于良知，谓吾心自有天，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。夫天则诚是也。目巧所至，不继之以规矩准绳，遂可据乎？且以舜、周公、孔子、颜、孟之知如彼，而犹好问好察，夜以继日，好古敏求，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，况以中人之质，而重物欲之累，而谓念念不过乎则，其能无少诬耶？”所以，他极力称赞清代“崇儒一道，正学翕兴”，陆陇其、张履祥“辟波辞而反经，确乎其不可拔”。^④他摆出一副与陆、王心学水火不相容的姿态。

然而，到了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曾国藩改变了腔调。他说：“朱子主道问学，何尝不洞达本原？陆子主尊德性，何尝不实征践履？”他甚至说：“姚江致良知，犹孟子道性善，苦心牖世，正学始明。”他企图抹煞程、朱与陆、王之间的重大歧异，认为他们的不同，只在“字句毫厘之间，可以勿辨”。于是，他歌颂道：“象山〔陆九渊〕、姚江〔王守仁〕亦江河不废之流……”^⑤

正如他的儿子曾纪泽在祭父文中所说，曾国藩“笃守程朱，不弃陆王”^⑥。

（三）否定理学的排他性

理学家们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们的理学是至高无上的，涵盖一切的，大于一切的。《宋史·道学传》说：“三代盛时，天子以是道为政教，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，党庠序弟子以是道为讲习，四方百姓用是道而不知。是

①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一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（五），岳麓书社1992年版，第3466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90年版，第21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65～166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（五），岳麓书社1992年版，第3466～3467页。

⑥ 《曾纪泽遗集》，岳麓书社1983年版，第156页。

故盈覆载之间，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。”理学家们认为“无一民一物”不在“理”的笼罩之中，“理”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源。二程说：“理则，自尧舜至于涂人，一也。”^① 陆九渊说得更明白：“此理塞宇宙，所谓道外无事，事外无道。舍此而别有商量，别有趋向，别有规模，别有行迹，别有行业，别有事功，则与道不相干，则是异端，则是利欲……”^② 这段话，除强调道的涵盖性外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穷道循道外，如“别有行业，别有事功”，都是“异端”，都是“利欲”，排他性很明显。

曾国藩在理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唐鉴，教导曾国藩说：“为学只有三门：曰义理，曰考核，曰文章。”考核之学，指汉学，唐鉴批评它“多求粗而遗精，管窥而蠡测”。文章之学，唐鉴认为，“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”。经济之学，即在“义理之内”。他甚至认为：“诗、文、词、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；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，彼小技亦非所难。”^③ 所以，剩下来需要潜心学习的，只有义理之学了。曾国藩一直深深接受了这番话。

但是，他后来又接受了姚鼐关于学术的分类法，认为“为学之术有四：曰义理，曰考据，曰辞章，曰经济”，正式承认了义理之外的其他学术的独立性，并把其他学术与“为大”的义理之学并列。为此，他在“孔门”的大旗下，寻找根据，说：“义理者，在孔门为德行之科，今世目为宋学者也。考据者，在孔门为文学之科，今世目为汉学者也。辞章者，在孔门为言语之科，从古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。经济者，在孔门为政事之科，前代典礼、政书，及当世掌故皆是也。”^④ 在这里，曾国藩对义理的解释，是很肤浅、勉强的。宋明理学，涉及宇宙论、认识论、方法论以及人生观的许多方面，怎么可以仅仅用“德行”二字概括？但是，他既然承认其他学科的独立存在与重要作用，说明他已从纯粹的理学的旧圈子里跳了出来。

正因为如此，曾国藩在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约直隶士子“以义理为先”，“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，使吾之所见，证诸古制而不谬；然后求所谓辞章者，使吾之所获，达诸笔札而不差，择一术以坚持，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”。他说：“百川异派，何必同哉？同达于海而已矣。”^⑤ 他这种视理学以外的其它

① 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。

② 《陆九渊集》卷三十五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7年版，第92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442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443页。

“异派”为“同达于海”的“百川”的思想，已彻底扫除了理学的排他性。他提出的“诸子皆可师也，不可弃也”的主张，正是基于这一思想。

曾国藩明明知道，“有汉学、宋学之分，断断相角，非一朝矣”^①，为什么在汉宋之间、程朱与陆王之间如此折衷调和呢？为什么对理学之外的其他学术，都如此包容呢？这是因为他确实看到了汉学和宋学各自的优缺点：“言艺则汉师为勤，言道则宋师为大”^②；“许、郑亦能深博，而训诂之文，或失则碎。程、朱亦且深博，而指示之语，或失则隘”^③。更重要的是，鸦片战争之后，咸同之际，内忧外患，清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，曾国藩与许多忧心忡忡的士子一样，都在寻找应变的措施，故他政治上极力呼吁“克己和众”，强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，学术上则主张折衷调和，企图让士子们消除分歧，都集合在“孔门”的大旗下，一致对付“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、诗书典则，一旦扫地荡尽”的“大变”^④。这正是曾国藩牖世的一片苦心。

①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90年版，第7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67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90年版，第6~7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223页。

曾国藩诗歌特色论^①

李剑波

曾国藩是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，也是重要的诗文作家。他以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，成为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；又以诗歌创作的突出成绩，成为道咸宋诗派的中坚。关于曾国藩的研究是一个热点，但是关于他的文学成就，研究不多，关于其散文与文学思想的研究略多一点，对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就非常罕见。以此之故，本文试图对其诗歌创作特色作一初步探讨。

其诗歌主要创作于道光十五年乙未（1838年）至同治十年辛未（1871年）间，共计存诗三百多首。

曾国藩诗歌题材的内容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二：

一是述怀言志，抒发年华易逝的感叹和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。曾国藩是一个精研理学和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文人，他的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和处世准则就是修齐治平和入世济世。因此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对功名事业的追求。如《感春六首》之六：“太华山顶一虬松，万龄千代无人踪。夜半霹雳从天下，巨木飞送清渭东。横卧江干径十里，盘坳上有层云封。长安梓人骇一见，天子正造咸阳宫。大斧长绳立挽致，来牛去马填坑罅。虹梁百围饰玉带，螭柱万石拟金钟。莫言儒生终龌龊，万一雉卵变蛟龙。”《小池》：“屋后一枯池，夜雨生波澜。勿言一勺水，会有蛟龙蟠。物理无定姿，须臾变众窍。男儿

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“清代宗宋派诗歌研究”（项目编号07JA751036）成果。